

汪建伟 关于“隔离”

我们在本雅明的《拱廊计划》研究的条目中，看到了他对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知识的记载：N16.4“……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从社会范畴上认识自然的，物质自然并不直接进入世界历史；相反，它是作为一种正在进行的物质生产过程而间接进入世界历史的，这个过程从最初就不仅是人与自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一切人类活动所预设的纯自然无处不被作为物质生产的自然所替代，即被人类的社会活动所中介并转换的一种社会“物质”所替代，因此，也就能够在现在或未来被进一步改造和修正。”

模型

塔特林（Tatlin）从接受第三共产国际的委托，到“第三共产国际纪念碑”的诞生，至今已经九十年（1919.10—2009.9），这个关于人类未来理想的方案，一直保持在模型的位置。它包括强烈的政治学隐喻、实用主义功能以及对于新型生产关系的想像，同时政治诉求被严格的分配到所有人造的技术指标、功能作用以及尺度（303米的高度指向将超过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埃菲尔铁塔）之中。

这个理想模型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希望建立起一种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政治理想与工业化生产有机结合的模式，并强调了新的生产方式的政治正确性。

生产

中国在整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以“经济、适用，在可能的条件下注重美观（周恩来）”为指导原则，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第三共产国际纪念碑”的政治理想，它们被整合为文化革命与艺术生产所共享的新秩序，现实被缝合在缜密的生产方式以及实用功能的统一体。它们呈现了几个基本特征：适合简单的，同时标准化的生产模式；降低生产成本，使产品保持在很均质化的状态以保证使用者在最大限度的平等，从而使差异降低到忽略不记，使技术有可能产生的特殊性消失；以及产品所关联的过程标准化，生产、运输、储存、使用变得尽可能的节约。

实践

《隔离》的基本材料全部来自于回收的旧家具，所有家具有明确的时间性，制作日期都是在五十至八十年代，它们既有别于中国传统制造工艺，又隔绝于当代制造业，成为某种特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承载，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如何被转化为意识形态物质化的过程记录。

这些意识形态的建构被分配在功能与使用，它保证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一致，产品的功能决定了意识的范围，同时，身体在使用过程中被同质化。

方法

《隔离》也可以被理解为另一种方式的建立，事物原有的秩序被部分解除，同时又部分的保

留，包括它们的物质属性和功能，它们被不同的描述方式重新组织，与其它的事物发生新的联系，在互相矛盾中共享彼此的差异，并发展为新的物质与功能的“有机体”。这既是我对于世界的一种看法，也是我对环境与自然的一种理解，即如何在一种关系、共享、重叠中去理解事物的态度。

现场

所谓整体应该保持在“散落”和“失序”的状态，坚持现场的非确定性，即“事件”的整体是建立在被不同的知识系统所描述的可能性，而不被完美的封闭在一种经验系统内。也许可以称之为对自然的拓扑学描述，不同的知识提供了对原有“事件”的“切割”性描述，使“事件”的整体性被破坏，既建立在某种秩序的唯一性受到质疑，同时，它使被质疑的部分成为了不确定的因素。